

研究报告

(2023 年第 7 期 总第 31 期)

2023 年 12 月 19 日

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典型案例分析

体育金融研究中心

黄旌沛 刘芯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宏观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的体育组织不断成长与发展，成为开展群众体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大力推动“健康中国”政策之后，基层体育组织迎来了发展窗口，在推进体育事业发展、推动社会健身和服务广大人民健身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转化，基层体育的发展也将肩负起新的历史任务，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典型案例，探讨我国全民健身发展新的路径。

目录

一、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现况	3
二、草根体育社团向协会制转型——苏州广场舞协会	7
2.1 协会概况	8
2.2 运营机制	9
2.3 活动组织	10
三、同构治理模式——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12
3.1 俱乐部概况	12
3.2 运营模式	13
3.3 活动组织	15
四、社会主体合作模式——凌云华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16
4.1 俱乐部概况	16
4.2 运营模式	17
4.3 活动组织	19
五、独立运作模式——南翔体育俱乐部	20
5.1 俱乐部概况	20
5.2 运作模式	21
5.3 活动组织	22
参考文献	24

一、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现况

近年来，在“健康中国”政策推广的背景下，2020年我国健身人口增长3.19%，健身人口渗透率为5.02%，环比增幅3.19%¹。这一系列增长的背后，既有健身产业的发展壮大，同时也离不开基层体育的蓬勃发展。在2012—2017年短短5年间，我国法人登记体育社会组织规模从2.3万个增长至4.8万余个，年均增幅远高于同期全国社会组织约4%的增速，与此同时，草根体育组织数量已超过百万，绝对数量还在增长。

虽然我国大众体育发展如火如荼，但由于我国基本国情与德、日等发达国家大相径庭，在基层体育的组织体系上也有较大的差异。相比德、日，我国基层体育的组织单位有以下特点：1、组织类型多，但以自发组织为主；2、公益性社区体育俱乐部力量薄弱，商业性体育俱乐部风险较大；3、专业体育服务差；4、资金来源匮乏。

组织类型多，但以自发组织为主。该特点的形成主要受我国体育场地建设的影响。**首先**，伴随着我国体育用地类型的不断丰富，体育用地在不断增加，我国各类型社区体育组织单位在体育项目、体育功能上更加多元。截至2019年，第七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类型达116种，相比1974年“一普”的6种类型而言，场地类型更加全面，且相比2014年的“六普”，“七普”增加了32种场地类型，包括11人制足球场、沙滩足球场、体育公园等。**其次**，我国体育用地虽种类众多，但数量分布上较为集中在市民益健苑点等开放型小区体育用地

¹ 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健身行业数据报告》

上（如表一），较为适合“草根体育”等基层自发体育组织的发展。

街道	市民健身步道	市民健身房	市民球场	市民健身益智苑地	总计	个数/街道面积 (KM2)	个数/实际人口 (万人)
宝山路	1	-	3	39	43	26.6	5.32
石门二路	2	-	2	20	24	22.47	6.58
曹家渡	-	1	1	75	77	51.94	10.48
大宁路	3	-	2	42	47	7.5	6.01
共和新路	2	1	-	62	65	23.89	6.64
江	2	1	-	45	4	26.08	6.07

宁路					8		
静安寺	-	1	-	31	3 2	20.41	10.38
临汾路	4	1	2	54	6 1	28.62	7.81
南京西路	-	-	1	28	2 9	17.91	7.49
彭浦新村	6	-	3	81	9 0	27.47	5.76
北站	2	1	-	8	1 1	6.28	1.41
彭浦路	7	1	4	96	1 0 8	13.76	7.06
天目	2	1	1	22	2 6	13.41	10.28

西路							
芷江西路	-	1	3	45	49	31.13	6.55
总计	31	9	22	648	710	19.34	6.57

(表 1: 上海静安区体育设施数量统计, 截至 2018 年)²

公益性社区体育俱乐部力量薄弱，商业性体育俱乐部风险较大。

我国基层体育组织存在治理不到位的问题。就正式登记的体育类社会组织而言，每万人拥有量仅 0.3 个，且基层体育组织单位城乡覆盖率也差异巨大。同时，由于公益性社区体育俱乐部在基层体育组织上的缺失，商业性体育俱乐部（如健身房）逐渐成为了大众体育的一种主导参与方式，但在实际情况当中，商业性体育俱乐部存在经营风险高³、费用高等问题，因此商业性体育俱乐部能否支持人民群众健身需求的多样性以及健身需求体量，尚存疑。

专业体育服务差。据艾瑞咨询发布的《2021 年国民运动健康洞察报告》披露，42.9%的受访者认为缺乏专业运动指导是当下参与健

² 数据来源：基于可达性与公平性的上海市静安社区体育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及优化对策，姚焯

³ 2020 年我国健身场馆倒闭率达 14.61%，健身俱乐部、健身工作室各自减少 11.1%、14.2%。数据来源三体运动数据中心。

身的主要困扰，33.2%的受访者认为缺乏运动时间是主要困扰，31.9%的受访者认为没有运动场所是主要困扰。

资金来源匮乏。据韩慧在《社会体育组织参与与基层体育治理的路径研究》一文中的调研数据显示（如表二）：社区体育俱乐部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政府拨款补贴，选择比例达80.1%（其中49%的俱乐部表示除政府补贴外无其它收入）；其次是政府购买收入，场馆经营、活动组织以及会费缴纳等自创性收入较少。

经费来源	比例（%）	排序
政府拨款和补助	80.3	1
政府购买体育服务	36.4	2
经营和组织活动收入	21.9	3
会员会费缴纳	15.6	4
社会捐赠	9.3	5

（表2：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经费来源一览表；n=93）

基于我国基层体育建设的实际情况以及现有的问题，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化的组织类型可分为以下四种：草根体育社团、社会主体合作社团、政府主导社团和独立运作社团。同时结合当下社区体育团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着重研究苏州广场舞协会、徐家汇社区体育俱乐部、凌云华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和南翔体育俱乐部四个典型案例。

二、草根体育社团向协会制转型——苏州广场舞协会

草根体育社团是指在自愿的基础上，由民众自发组织，自我管

理，扎根基层开展体育活动，满足普通民众体育需求为主要目标的体育组织，是我国社区体育的主要组织方式。草根体育社团在我国通常有以下 3 点特点：1、松散性，并非哪级政府或社会团体组件的公益性体育活动机构，由有共同爱好的群众自发组织，社团往往没有制度和纪律约束，成员关系松散；2、不确定性，人员、类型、活动规则和数量上存在不确定性；3、开放性，人员准入通常无排他性。在全面健身推广的进程中，草根体育社团在组织民众健身、开展民众喜欢的体育活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在合法性、管理机制、融资来源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问题。在我国草根体育社团当中，富有代表性的便是广场舞组织，自 2015 年文化部等四部委发布《关于引导广场舞活动健康开展的通知》，各省市通过成立广场舞协会的形式，加快、加强了广场舞草根团体的协会化管理机制，并取得了较为客观的成效。在此，我们以苏州广场舞协会为例，探讨其内在机理和治理机制。

2.1 协会概况

苏州市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由从事专业广场健身舞运动工作者与广场健身舞运动爱好者共同自愿组建的地方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接受业务主管单位苏州市体育局、协会登记管理机关苏州市民政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同时，在协会成立之初便确立，在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发扬广场舞文化、传播全民健身及广场健身舞技能、以“健康、快乐”为主题、丰富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增强市民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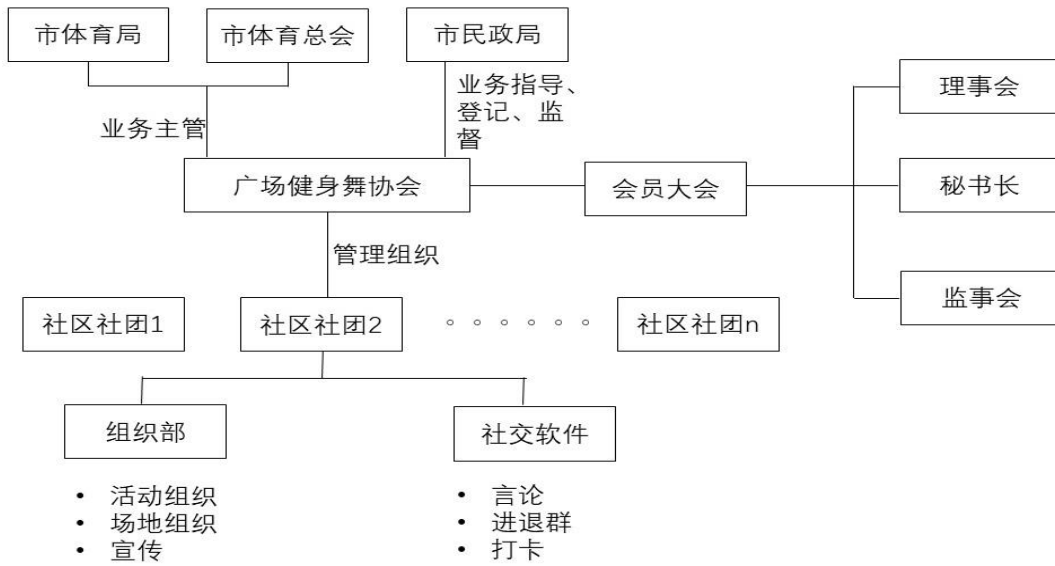
体素质及艺术欣赏能力、促进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交流和友谊、提高广场舞技术水平等为目标，促进广场舞乃至全面健身运动的开展。

目前，苏州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通过协会组织架构，联通了主管单位和草根体育社团，构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模式。这一模式较为有效地解决了传统广场舞草根社团组织松散、管理混乱等问题。同时采取会员制的方式，较好的聚集了广场舞爱好者，保证了会员的相关权益。

2.2 运营机制

在协会制度的框架下，苏州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为以体育局为代表的体育治理体系和群众自发形成的草根社团构建了沟通渠道。因此，苏州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在组织运营机制上，可纵向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即主管单位的协助组织和草根社团的管理组织（如图一）。在这一管理模式当中，市体育局、民政局、体育总会作为主管单位，统筹和监督广场健身舞协会的机构运行，并确保其正确发挥职能。而在协会内部管理中，苏州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采取会员大会制度，即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部门，理事会为会员大会的权力代表部门，秘书长为主要形成机构，监事会为监督、监察部门，这一运作流程能确保协会的工作规划、工作目标是建立在会员公共意愿的基础之上，同时亦保障权力行使的高效和可监督。在统筹管理草根广场舞社团方面，虽原个人成员被纳入协会会员，但协会对草根广场舞社团的管理仍采取负责人管理制，而各个草根社团在具体活动组织、场地组织等方面仍保留较大自主权，仍采取原有的自发组织和社交媒体建群

交流的方式，开展日常的体育活动。



(图 1：苏州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组织框架)

在吸取社会融资方面，除政府补贴、会费收入以外，协会也通过单位会员、企业赞助等方式吸纳社会资金。这是因为协会作为苏州市民政局备案的合法社会团体，相比原先由群众自发形成的草根广场舞社团，在财产保护、会员吸纳等方面，具备法律保护效应。（相关赞助单位如图二所示）



(图 2：苏州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部分会员单位名录)

2.3 活动组织

基于苏州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章程与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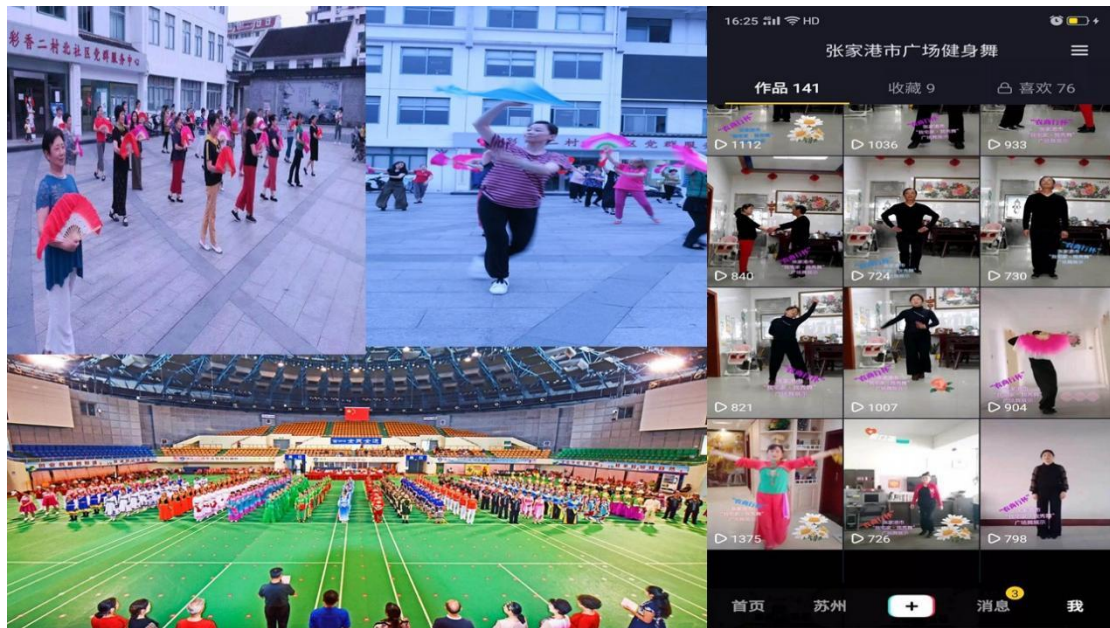
的活动组织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提供专业指导；二是组织赛事，构建交流平台；三是协助政府和主管单位搞好管理工作。

在提供专业指导方面，苏州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通过编排舞蹈、安排志愿者等方式为草根广场舞社团提供帮助。例如，苏州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层邀请省广场舞副会长对《洪湖岸边是我家》这首红歌进行编舞，并且整体动作的编排都十分受广场舞会员们的喜欢。又例如，苏州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的一位老师，该老师是一位外资企业的高管，在每天繁忙的工作之余，都会来到这里带领大家一起进行锻炼，在她接任社团领舞的三年时间里一共教了队员 77 支舞蹈，基本保持在每月 2 支新舞。

在组织赛事，构建交流平台方面。苏州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不仅承担了苏州市各届广场健身舞大赛⁴的组织工作，还积极选拔各社区广场舞队的优秀领队在协会或省外进行广场舞交流培训。与之同时，在疫情期间，通过抖音等社交平台，开展广场舞线上教学活动，让广大爱好者居家也能健身。

在协助政府和主管单位搞好管理工作方面。苏州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作为民政局备案的社会组织，对外积极沟通场地管理以及社区基础部门，让其支持广场舞运动的发展，对内合理制定各草根社团广场舞的运动规划，让广场舞成为一种有组织、有纪律的大众体育方式。通过协会的管理与沟通，广场舞活动与社区关系较为融洽，原有的用地争端、噪音扰民等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⁴ 现已举办 11 届



(图 3：部分组织活动)

三、同构治理模式——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自 2004 年上海市承担创建国家级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试点工作，开始积极探索创建市级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工作。截至 2019 年底，上海已成立 170 家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这些俱乐部推动了社区体育管理模式向多元主体共治的转变，对基础体育治理效能的提升具有极大的影响。这类体育俱乐部具有明显的同构表现，即社区体育俱乐部与街道同构在一起，街道拥有社区体育俱乐部的运营权，机构设置、人员配置、人事任免、资金拨款等方面都由街道直接进行，在成立之初便有着浓厚的官办色彩。在此，我们以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为例，探讨其内在机理和治理机制。

3.1 俱乐部概况

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成立于 2005 年，由政府部门出资成

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由原本社会体育指导站的负责人担任法人，同时兼任俱乐部主任负责俱乐部运营工作。在俱乐部创立之初，主要依靠租用文体中心的场地开展活动，徐家汇篮球公园便是其主要活动场地，2007 年开始建立街道活动中心，除此之外，其余健身场地仍采用租借方式解决。

截至目前，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除负责人由街道领导担任外，另有 3 名专职人员，1 名为社工，2 名为退休返聘人员。在俱乐部定位上，由于徐汇区街道为老龄化社区⁵，同时俱乐部也位于徐家汇金融商圈，其主要服务对象除周边社区居民以外，也会兼顾周边企事业单位的白领人群。因此，在活动组织、体育服务提供等方面，即会兼顾周边居民喜爱的传统社区运动，也会兼顾白领人群喜爱的时尚类运动。

3.2 运营模式

俱乐部的主体运营主要依托与街道，并呈现出典型的行政化特色，在工作安排和工作执行等方面都需要相关领导的审批。除此之外，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更多是承担街道交代的各项体育事务，对其它公共体育事务的承接缺乏主观性和主动性。总而言之，在管理模式上，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更像街道的社区体育事务性部门，承接街道安排的体育事务，而非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体育运营机构。而从俱乐部人员构成上来看，工作人员能为居民直接提供专业体育服务

⁵ 社区内老龄化人口占比达 33%，以达到联合国划分老龄化社区的标准。

的能力弱，与单项体育协会合作是其补充专业缺失的主要方式。

在场地运营方面，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配备了市民健身房、乒乓球房，同时街道还有 50 多个健身苑地、3 条健身步道、多片篮球场地等，但即使如此，社区体育的用地依旧紧张，仍需要通过场地租赁等方式寻找相关活动场地。对于租借或与学校等单位展开场地合作，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采取以街道名义承担管理工作，让居民以身份证换健身卡的方式代替繁琐的学校门卫登记方式，极大的提升了居民使用学校体育用地的便利性。



（图 4：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部分设施配套）

在资金运营方面，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以政府拨款为主，自我创收为辅。关于政府拨款，俱乐部开设了独立账户，通过预算上报、体育服务采购等方式获取政府拨款，在针对社区体育的资金使用上，虽要受街道的监督，但在项目签订等方面，经费支配享有较大的自由权利。关于独立创收，俱乐部较好利用了白领人群的体育消费需求，举办了篮球、羽毛球、电竞、网球等时尚体育赛事，并实现了赛

事创收。

3.3 活动组织

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活动组织，主要围绕在开展居民健身活动、协调场地资源、开展赛事活动和居民健康检测四个方面。

在开展居民健身活动方面。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采用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即通过自愿者招募、单项协会培训指派等方式，让专业体育指导员进入社区当中。同时，在其它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中，还出现了居民楼体育指导员的方式，让单位居民楼的居民作为健身指导员，通过布告张贴、微信群等方式组织和辅导大家活动。即实现了居民强壮体魄的目的，又实现了以运动会友、促进邻里关系的作用。除居民活动之外，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也打入企业，为白领开设了“午间一小时”的体育活动，让全民健身进入了办公楼宇。

在协调场地资源方面。介于俱乐部是由街道直接主管的居民体育事务机构，它能有效的对接学校、体育局等体育场地管理单位，协调各方体育场地资源开展体育锻炼服务。除此之外，俱乐部同样也会协调居民日常生活与体育活动、体育用地之间的关系，让社区体育所产生的噪音困扰、场地占用等问题减少。

在开展赛事活动方面。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积极承担各街道间的群众赛事，组织群众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在增强居民身体素质、丰富大众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体育文化和健康知识。

在居民健康检测方面。徐家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秉持着“全民

健身与健康中国有机结合”的理念，在组织相关体育活动的同时，同样注重居民的身体状况检测与检测数据采集，同时联动家庭医生和医疗机构，普及健康知识和拓宽居民健康知识。

四、社会主体合作模式——凌云华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社会主体合作模式的本质是整合社会各方体育资源，形成推动大众体育发展的合力，其中以街道和学校之间合作搭建社区体育俱乐部的模式较为符合我国的国情。学校是体育资源的重要聚集地，截至2013年全国高等院校拥有体育场地4.97万个，占全国体育场地总数2.94%；全国大学体育教师总人数达10万以上，拥有优质且大量的体育专业人才储备。因此，在我国上海等人口基数大、时空限制多、基层群众专业体育指导服务较弱的区域，正在开始“街道—高校”合作的体育俱乐部模式。在此我们以上海“凌云—华东理工大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为例，进一步对该模式进行探讨。

4.1 俱乐部概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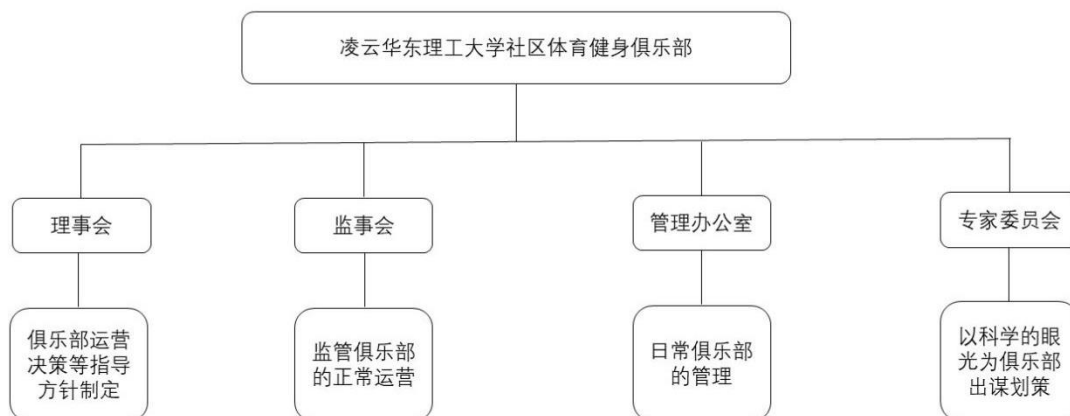
凌云华南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成立于2009年，是上海市第一家社区与高校联手打造的实体化健身俱乐部，开创了上海市“社区—高校实体化共建俱乐部”的先河。该俱乐部由凌云街道办事处提供资金协助，华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⁶提供实践运营、场地资源、指导服务等专项支持。

⁶ 全称为华东理工大学体育科学与工程学院

在这一合作机制下，华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与上海市凌云街道构建了体育物力资源和体育人力资源的共享模式。在物力共享方面，“街道—高校”合作模式在场馆设施、技术信息等方面与街道群众实现了共享，解决了社区体育活动用地、设施使用等基础问题。在人力资源共享方面，华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通过专业师资、体育生提供专业指导服务的方式，让社区群众体验到专业的体育指导服务。截止目前，90.6%的居民对社区内学校体育场馆的使用表示满意。

4.2 运营模式

在“街道—高校”合作模式下，凌云华理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人事安排由凌云街道党工委书记担任理事会名誉理事长，街道办事处主任担任俱乐部理事长，华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担任俱乐部主任。此外，双方各安排一名管理人士担任监事会工作人员。管理办公室常设一名办事员负责日常事务，专家委员会则由街道文体干部和华东理工大学的教授团队构成。



（图 5：凌云华东理工大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运营框架）

俱乐部的整体运作围绕着五个准则开展。（1）自治模式：采取高校托管、社区监督的方式，让俱乐部得到专业而相对独立的运营管理。（2）共享模式：街道牵头，华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策划组织以及场地、人员共享。（3）服务采购模式：街道对华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在场地设施使用、专业人员派遣等方面采取服务采购模式。

（4）场地设施提供模式：华东理工大学采取“免费+优惠”模式，即室外场地免费向居民开放、室内场地向居民优惠开放。（5）师生队伍社区指导模式：俱乐部现有社会体育指导员 80 余名，外聘资深专家 8 名，已初步形成资深专家教练、体育指导员以及团队负责人三级体育服务模式，且体育服务团队人员构成多为华东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师生。

在资金支持方面，社区每年度向华东理工大学提供总计不低于 20 万的资金，用于俱乐部的运作。该项资金每年分两次支付，委托华东理工大学财务处统一管理。政府出资的条件是俱乐部在运营内容、方式、范围、对象和规模规格等方面需达到凌云社区提出的要求和构想。



(图 6: 华东理工大学部分运动场地展示)

4.3 活动组织

俱乐部活动内容主要分为四大板块，分别为“赛事活动”、“体质测试”、“健康讲座”及“指导站”服务。“赛事活动”主要有俱乐部承办的“凌云社区运动会”，逢单数年由社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组队参加，逢双数年则由各居委会组队参加，运动会的内容多为体育游戏，适合社区群众的参加。除此之外，俱乐部根据社区居民的喜好，还组织了羽毛球、气功等赛事。“体测监测”主要利用华东理工大学体能实验室和健身房为社区居民开“运动处方”，旨在改善社区居民健康状况、实现科学健身。“健康讲座”则是利用社区活动中心或学校空余教室，聘请运动、健康、医学和养生方面的专家，为社区居民开展康养讲座，提升居民的健康认知。“指导站”板块主要面对青少年的体育训练需要，集中在双休日或寒暑假期间，为社区儿童提供各类项目的培训指导，如篮球、足球、羽毛球等。



(图 7：俱乐部部分活动展示)

五、独立运作模式——南翔体育俱乐部

独立运作模式是为了让社会组织（如协会、企业等）承担起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责任，同时它也是同构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向社会主导的转型。通常，这类俱乐部由社会人士独立出资成立，在运营初期由政府提供扶持资金，在扶持期后，政府不再提供资金扶持，仅在场提供、水电费补贴等方面提供约定的减免支持。目前，上海已成立或转型多家独立运作模式的社区体育俱乐部，其中以上海嘉定南翔社区俱乐部为这一模式的代表。

5.1 俱乐部概况

南翔俱乐部成立于 2007 年，最早由南翔镇文化体育服务中心建立并负责管理，法人由该中心副主任担任。成立之初，俱乐部除承办一些社区赛事活动之外，无其它日常运作。随着国务院 46 号文的出

台以及上海市政府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嘉定区政府大力推动体育团体实体化运作，南翔俱乐部成为首批由体制内管理向实体化运作变革的社区体育团体。

自 2016 年正式完成交接，俱乐部法人由当地健身房店长（社会法人）担任，负责南翔俱乐部的具体运营。在俱乐部实体化运作后，得益于专业团队的管理，俱乐部已配备多名专职健身房工作人员（大部分具备体育背景），同时在设备更新、活动组织上更加注重以市场化的方式满足社区居民的健身需要。

5.2 运作模式

虽然，南翔俱乐部已在运作人员上实现独立，但当地政府对该俱乐部仍具有“监管+培育”的职责。因此，相比同构治理模式和社会主体合作模式的俱乐部，南翔俱乐部在行政影响上相对独立，而相比商业俱乐部，在政策、资金扶持上会得到政府更多的帮助。该模式对于我国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推进作用：首先，俱乐部独立运作但行政依托上不完全离开政府，即让俱乐部的运作更具备市场化特征，又通过政策、资金引导让其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从而实现政府与商业机构的社会资源共享；其次，引入竞争机制，独立运作模式大大降低了政府运作社区体育俱乐部的机会成本，同时该模式具有可扶持性，因此南翔政府多地试点，开展多个社区体育俱乐部“独立化运作”，从而形成区域间社区俱乐部的竞争；最后，较为灵活且合理的政府监管机制，南翔政府通过对签约时限的控制、俱乐部法人资格罢免权的保留以及理事会的参与，在不干预俱乐部日常经营的情况

下，较好的把握俱乐部的运营方向。



（图 8：独立运作供给模式）⁷

在政府资金扶持方面。自 2016 年完成独立运作改造后，南翔镇文体服务中心与俱乐部达成协议，在 2016—2019 年期间政府免去俱乐部健身房房租、电费，19 年后俱乐部将支付一定比例的电费，逐步在商业运营上实现独立运作、自负盈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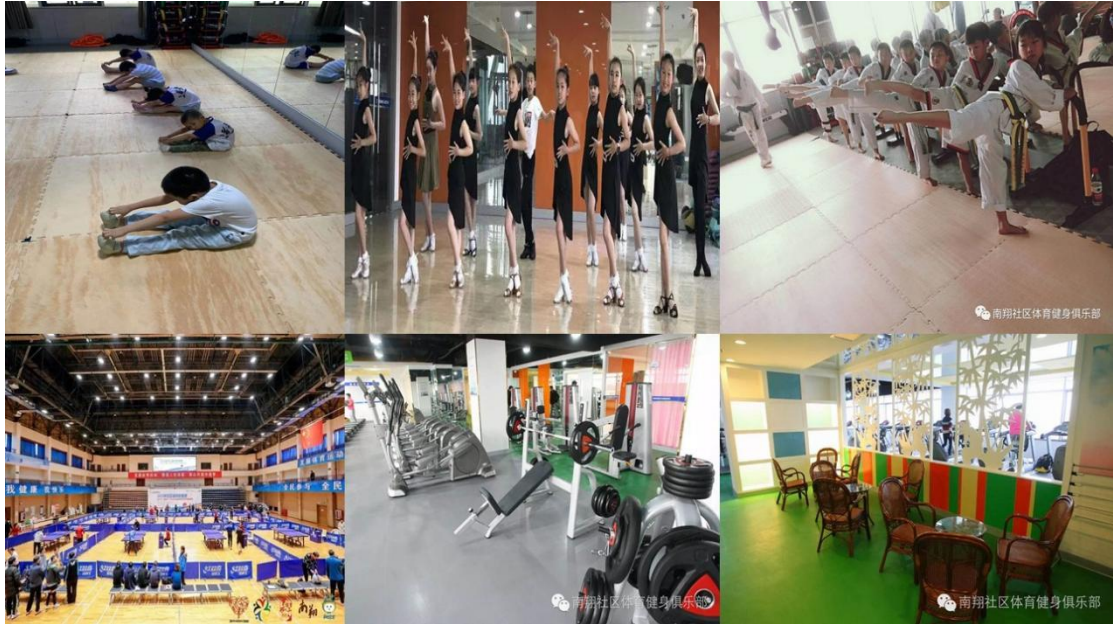
5.3 活动组织

从营业收入占比来看，南翔俱乐部主要活动为社区健身房（收入占俱乐部整体收入约 70%）。关于社区健身房活动的开展，南翔俱乐部主要参照商业健身房运营模式，即良好的健身房设施、专业健身指导配套，收费采取年卡制度，同时为了更好的服务社区居民、体现俱乐部的公益化职责，南翔俱乐部还开展了“一元钱健身”等惠民服务。除健身房运营以外，南翔俱乐部还肩负着社区居民健康监测和社区赛事组织活动，现承担了网球团体赛、乒乓球赛、篮球赛等。

在开展居民趣味活动方面，南翔俱乐部开始了多类兴趣班，并通

⁷ 来源：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参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研究——以上海市为例，熊行雯

过私教模式让专业指导与社区居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目前已开设拉丁舞、爵士舞、跆拳道、瑜伽等课程，涉及人群既有青少年群体，也有成人群体。同时课程性质既有公益性课程，也有商业性课程。



(图 9：部分活动及场地展示)

参考文献

- [1] 许白洁. 中国第七次和第六次体育场地普查指标体系对比研究[J]. 四川体育科学, 2021, 40(03): 37-41+58.
- [2] 姚烨. 基于可达性与公平性的上海市静安区社区体育设施空间分布特征及优化对策研究[D]. 华东师范大学, 2019.
- [3] 汪文奇, 金涛, 冯岩. 新时代体育社会组织参与体育治理的机遇、困境与策略行动[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8, 52(11): 12-17.
- [4] 李沐阳. 草根体育组织的内涵、现状和路径选择[J]. 韶关学院学报, 2021, 42(03): 75-79.
- [5] 祝良, 李建国, 孟欢欢. 创新社会治理背景下上海市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的实践经验与转型思路[J]. 体育科研, 2018, 39(04): 34-39.
- [6] 宋宇虹, 朱晓东, 王跃等. 城市社区与高校体育资源共享研究——以上海凌云社区与华东理工大学的体育资源共享为例[J].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2012, 26(06): 30-32+51.
- [7] 倪晓鸣. 上海市社区—高校体育资源共享现状——以凌云—华东理工大学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为例[J].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 2017, 35(05): 43-46+55.
- [8] 熊行雯. 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参与社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的研究[D]. 上海体育学院, 2018.

（作者：黄旌沛、刘芯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体育金融研究中心研究专员。）

联系人：刘芯

邮箱：liuxin@pbcfsf.tsinghua.edu.cn
